“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被钟嵘称为“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吴亡,陆机、陆云隐退故里 10 年,后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受到器重,但政治上却不得志,陆机甚至死于“八王之乱”。陆机和陆云的性格迥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繁缛,陆云鲜净。然而两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陆机的作品《文赋》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美学标准和文体的分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

[关键词] 陆机;陆云;文学创作;《文赋》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2)03-0012-06

钟嵘《诗品序》说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太康为晋武帝年号(280 ~ 289 年)。钟嵘所列作者,主要活跃在魏晋交替之际。所谓“三张”,指张载、张协、张亢。 “二陆”为陆机、陆云。 “两潘”是潘岳、潘尼。一左即左思。钟嵘《诗品》置陆机为上品,与曹植、谢灵运并列,冠以“太康之英”,把陆机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萧统编《文选》收录其诗歌 52 首,高居全书榜首。唐初编《晋书》,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写《陆机传论》,以示敬重。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据此可见一斑。

一、“二陆”的身世

陆机(261 ~ 303 年),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陆云(262 年 ~ 303 年),字士龙,陆机弟,与其兄陆机齐名,世称“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陆机《吴趋行》说 “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① 所谓“八族”“四姓”,李善注引张勃《吴录》说 “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条刘孝标引《吴录士林》说 “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同书《赏誉》中有一条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说明当时的四大家族,各有特点,陆家忠诚,称誉吴地。

六朝时期,崇尚门第。陆机《文赋》就说,文学作品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弘扬前代功德,展现历史荣耀,无外乎是为了增强现实的自信。陆机不仅这样说,也确实有许多创作实践,譬如辞赋方面,陆机有《祖德赋》和《述先赋》。在赞、颂方面,陆云有《祖考颂》,又《三国志·陆逊传》裴松之注引《陆氏祠堂像赞》和《陆氏世颂》,虽不详其作者,但可以推断为陆氏家族所作,据此可见这个家族的高门意识与文化自负。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族里,陆机、陆云兄弟肯定带有比较强烈的高门望族意识与文化自负心理。加之二陆幼有俊才,很早就为牙门将领兵,称誉乡里。《世说新语》记载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就与二陆有关。据说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当地山中有虎,水中有蛟,乡间有周处,人称三横,或曰三害,为乡亲所患。有人出主意,想借周处之手先除掉二害。周处杀死老虎与蛟龙后,乡人依然不乐,后来才知道自己在乡亲心中也是一害,于是决心悔过自新。亲自到吴地寻找二陆,说自己很想改邪归正,但老大不小,很难再有成就。陆云对他说 “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周处从此奋发图强,最终成为忠臣孝子。由此可见陆家在吴地的影响,二陆在青年中的地位。

[收稿日期] 2012 - 04 - 28
[作者简介] 刘跃进,男,吉林白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文选》卷 28。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个家族的自负与高傲直至东晋南朝依然根深蒂固。晋室南渡之初，丞相王导想结援吴人，便向陆玩请婚。陆玩义正辞严地说：“培塿无松柏，熏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①当然，东晋时期的北人南下与西晋初年的南人北上，文化心理各不相同。东晋时的北人无奈渡江，有寄人篱下之感，所以，北人谦卑而南人傲慢。而西晋初年则与此相反。当时，南人是作为被征服者被迫北上，北人有着文化正宗的心理，自然不把南人放在眼里。

太康元年（280 年），晋武帝出兵伐吴，作为吴国世家大族，陆机被俘，俯首入洛，心情自然不畅快。从此，二陆的生活进入第二个时期，从一个贵公子孙，成为了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这样的生活自然不会快意，所以不久二陆就回归故里松江华亭，闭门勤学。史书记载，华亭有清泉茂林。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多年。太康末年，晋武帝下诏举清能、拔寒素，有着强烈家族观念的二陆，踏上了北上的路途，从此就永远告别家乡。张华素重二陆之名，称之为“东南之宝”，一见如故，并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②在张华的荐举之下，二陆兄弟迅速在洛阳成名，其文学才能为世人所重。

但是，吴人在政治上并没有得到重视。晋武帝公开说：“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越睢，屡作妖寇。”因此吴人仕宦，倍加艰难。陆机自己也说过：“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1] 691 对此，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中分析说：“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而有着强烈仕进心的陆机当然不甘心于此，于是寻找各种发展机会。陆机先是被太傅杨骏辟为祭酒，会杨骏被诛，又迁太子洗马、著作郎。这些官位都比较低下，与他振兴家业的抱负相去甚远。而年齿日长，故有“日归功未建”的焦虑。正好这时，当朝权贵贾谧邀请陆机作为幕僚，与石崇、欧阳建、潘岳等为伍，成为“二十四友”之一。贾谧为人处世，浮华奢靡，“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2] 1173，颇为天下正直人士侧目。对此，陆机并非一无所知。他在《长安有狭邪行》中说：“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这里也许有着若干潜台词，即认为自己卖身投靠贾谧，或踏上“歧路”。而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陆机这样的性格，也只能选择这样的道路。陆云得到张华的举荐，历任尚书郎、侍御使、太子中舍人、中书舍人等职。司马颖推荐其为清河内史，故世称“陆清河”。

西晋末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终于酿成“八王之乱”，陆机先为赵王司马伦中书郎，伦败，陆机受牵连入狱，赖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司马晏救理。其后陆机感成都王活命之恩，遂力事成都王颖。颖以陆机参大将军军事，后复以陆机为平原内史，故世称陆机为“陆平原”。太安二年（303 年），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举兵讨伐长沙王乂，颖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率兵 20 万，南向洛阳。结果鹿苑一战，机军大败，人马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司马颖大怒，遂诛陆机，并夷三族，陆云同时遇害，举世为之惋惜。《世说新语·尤悔》记：“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这个卢志，与陆机兄弟初次见面就闹得很不愉快。《世说新语》记载，卢志曾用挑衅的口吻当众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陆机也当众大声答曰：“如卿与卢毓、卢珽。”卢毓是汉末大儒卢植的儿子，有名于世。卢珽则位至尚书。陆云见状，大惊失色。出来后对陆机说：“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陆机怒气冲冲地说：“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陆机肯定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涿郡人卢志，给了他致命的一击。陆机怀念家乡的鹤唳之声，犹如当年李斯被杀之前，也曾对其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是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陆机的遭遇，给了江南人些许教益。后来，在洛阳做官的张翰见秋风起，想起家乡的鲈鱼脍，竟然放弃官位，命驾而归。可是陆机在当时实在没有这样激流勇退的智慧和勇气。作为一介文人，一个出身于高门的文人，有着太多的眷恋和渴望，这些理想和抱负牢牢地牵制着他的身心，决定了他的悲剧的命运。

二、“二陆”的性格

陆机与陆云兄弟，同出高门，文采斐然，而性格却迥异。这种情形，近似于曹丕、曹植兄弟。刘勰曾比较曹氏兄弟说：“子建思捷而才俊，”“子桓虑详而力缓”。这里，刘勰用“思捷”与“虑详”来概括俩人的性格特征是比较贴切的。俩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

① 培塿，小山坡。松柏，大木。熏，香草。莸，臭草。

② 见《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晋阳秋》。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性格类型。从心理机能上说,曹丕属于理智型,以理智来衡量一切;而曹植则是情绪型的,体验较为深刻。从心理活动倾向上说,曹丕内向、沉静、反应较迟;曹植则外向,善于交际。从社会活动方面来看,曹丕是权力型的人物,而曹植则是审美型的。性格的不同,反映在创作中,就有明显的风格差异。

二陆也有着类似的情形。他们同出高门,有着强烈的门第意识;同时,又都有着很高文学造诣。二陆初入洛阳的时候,听从了张华的指引,前去拜访刘宝,刘家刚刚遇丧事,又好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这等于无视二陆,似视为乡里人。对此,陆氏兄弟殊感失望,后悔前往。

还是初入洛阳的时候,在张华处,陆云见到了河南颍川的荀隐(字鸣鹤)。两人各自介绍时,陆云举手说"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骎骎,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华在一旁抚掌大笑。这番对答,陆云实际处于下风。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晋书·左思传》载:"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实际上,左思的《三都赋》,洛阳传诵,一时为之纸贵。不知陆机当时作何感想。我们从陆云的《答兄平原》诗中或可窥探一斑:"昔我先公,邦国攸兴。今我家道,绵绵莫承。昔我昆弟,如鸾如龙。今我友生,凋俊坠雄。家哲永徂,世业长终。华堂倾构,广宅颓墉。高门降衡,修庭树蓬。感物悲怀,怆矣其伤。"说明二陆的内心充满忧伤,诚如陆云所说:"文章既可自羡,且解愁忘忧。"这里的忧愁,自然有着感叹家道衰落的悲情成分。

毕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多是解经之士。"衣冠士族,并在中原"。而江南文化,在魏晋时代,还在发展变化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上的陆机、陆云兄弟更多的是依靠他们之间的亲情,相互赠答,彼此支撑,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世说新语》载:蔡谟在洛阳时,看见陆机兄弟住在三间瓦屋中,陆云住东头,陆机住西头。相聚时,共同读书,彼此切磋。陆云有《与兄平原书》,多有探讨诗赋创作的内容。《颜氏家训·文章篇》记载说,江南世族有一个文学传统:"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就是说,一篇作品完成后,先要经过族中亲友的批评鉴定,才能公之于众。这种风气相延既久,已成为高门望族延续其文化优势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而当他们分别时,又题诗奉赠,抒发离别之情。这类作品,在二陆的集子依然还存在若干首。这种手足同根之情,又与曹丕、曹植兄弟彼此猜忌倾轧形成鲜明对照。

但二陆在性格上又有很大的不同。陆云为人弘静,文弱可爱,时人称为当代颜渊,所以怡怡然为士友所宗。而陆机则风格凌厉,言多慷慨,声如宏钟。这种性格,如果仅仅局限于文人圈内,也许是有才的表现,但是如果在官场还是这样口无遮拦,当然就很危险。一次,陆机造访王济,王济正在吃羊酪,指着问陆机:"卿江东何以敌此?"陆机回答说:"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鼓耳。"羊酪,南方人吃不惯。《世说新语》记载,陆玩造访王导,王导用羊酪招待他,结果陆玩大病一场。第二天还给王导写信,说"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这也使陆机得罪了若干权贵。

性格的不同,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文心雕龙·才略》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能制繁。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陆机繁缛,陆云鲜净。这是二陆在文学风貌方面明显的不同。

三、"二陆"的创作

《历代名画记》引陆机言论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所谓"美大业之馨香",与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有相近的地方,说明二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这是二陆创作思想很重要的方面,这与他们高贵的身世背景不无关系。

陆云《与平原书》,谈到若干创作问题,他说自己"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今天保存下来的作品,如《岁暮赋》《愁霖赋》《寒蝉赋》,作者自云"情言深至。"他评价陆机的章表也是"深情远旨,可耽味,高文也。"他推崇"清省",推崇"清新相接"。他曾不无自省地写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洁而不取悦泽。"从这里看出,陆云的创作有个变化的过程,年轻的时候注重辞藻,而后来则强调情深、旨远,主张清省,注重洁简。

这便与陆机的铺采摛文形成鲜明对照。刘勰《文心雕龙》论及陆机的创作,常常用"繁"字来形容。如《史传篇》:"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议对篇》:"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而诡辞弗剪，颇累文骨。”《体性篇》：“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镕裁篇》：“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才略篇》：“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序志篇》：“陆机《文赋》巧而碎乱。”在刘勰看来，陆机创作之“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著作之繁。就个人作品收录种类而言，陆云曾为之编文集 20 卷，《北堂书钞》卷 100 引晋代葛洪《抱朴子》云：“吾见二陆之文百许卷，似未尽也。”《昭明文选》收录陆机 52 首诗，列全部作家之首。钟嵘《诗品》将陆机与曹植、谢灵运并列，分别作为三个时期的代表，陆机被称为“太康之英”。据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附录《陆机著述考》，陆机著作包括《晋纪》4 卷、《洛阳记》1 卷、《要览》若干卷、《晋惠帝百官名》3 卷、《吴章》2 卷、《吴书》、《连珠》若干卷及《文集》47 卷。其著作之繁，正符合刘勰所说“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隋书·经籍志》著录《陆机集》，注：“梁四十七卷，录一卷，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陆机集》15 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并著录《陆机集》10 卷。晁公武言：陆机“所著之章凡三百余篇，今存诗、赋、论、议、笺、表、碑、诔一百七十余首，以《晋书》《文选》校正外，余多舛误。”由此看来，宋人所见已是一个辑本，原来唐人的十五卷本已经散佚。明代张燮辑《汉魏六朝七十二家集》、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皆有《陆平原集》。《四部丛刊》有《陆士衡文集》10 卷，《四部备要》有《陆士衡集》10 卷，《丛书集成初编》有《陆士衡文集》10 卷，附札记 1 卷。1982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今人金涛声点校的《陆机集》。该书以《四部丛刊》中《陆士衡文集》为底本，参以各总集、类书及其传中的有关部分，点校而成。正文 10 卷，补遗 3 卷，附录有陆机的专著《晋纪》《洛阳记》《要览》，陆机传记资料，《陆机集》序跋。就版本而论，这是较为完备的一个本子。注本主要有两种：一是郝立权的《陆士衡诗注》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二是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二，文情之繁。文情之繁，莫如《叹逝赋》。其中“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其境界犹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借用闻一多的评价，即充满了所谓宇宙意识。《赴洛二首》《赴洛道中作二首》更是文学史上的名篇，颇为感人。《吴趋行》夸耀吴地之美，劝说“楚妃”“齐娥”暂且停唱，倾听“我歌吴趋”，自“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开始，从城、楼、阁、轩、山泽土风、八族四姓诸方面，颂扬吴地吴人之美，发端立意，铺陈排比，无不模仿汉赋。《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张华对陆机的评语“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钟嵘《诗品》也说“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第三，辞藻之繁。清人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3] 客观地说，排偶句式，在陆机以前偶有所见。但如《猛虎行》《从军行》《招隐》《于承明作与士龙》那样对仗工整，铺陈繁富，确实不多见。这与建安文学“不求纤密之巧”①的粗疏文风不同。这应当说是陆机对于文学的贡献。其他如《赠冯文熙迁斥丘令》比喻之别致，《文赋》分析之细密，《赠尚书顾彦先》用字之考究，如此等等，也赢得后人推崇。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评价很高。才华横溢而又“不逾矩”乃是最高之境界。恰恰在这一点上，刘勰对于陆机似乎有所不满，说其“情繁”，“缀辞尤繁”。即辞藻过於繁茂，缺乏剪裁。《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孙绰的话来说，欣赏陆机的文章需要“排沙简金”的功夫，才能“见宝”，因为“陆文深而芜”。这“芜”即“繁”的另一种说法，多少含有贬义。

陆机的文和赋也很有成就。文如《辨亡论》《五等论》《平原内史表》《汉高祖功臣颂》《演连珠》《吊魏武帝文》等，赋如《豪士赋》《叹逝赋》《文赋》等都为《文选》所收录，为后人传诵。其中，二陆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陆机的《文赋》。

四、《文赋》的意义

《与兄平原书》第八札：“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不？《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覆灭。《漏赋》可谓清

①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感逝赋》,《陆机集》作《叹逝赋》,前有小序“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文赋》在这封书信中与《叹逝赋》列在一起,大约是 40 岁左右的作品。杜甫《醉歌行》又说“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少年能缀文。”因此又有可能作于 20 岁前后。陆云信中说“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据此推测,《文赋》应当是陆机创作比较成熟的作品,得到了陆云的高度赞扬。很快,《文赋》就在世间流传开来。昭明太子编《文选》收录此文,初唐书法家陆柬之专曾抄录,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日本高僧遍照金刚来中国访学时,收罗各种资料编为《文镜秘府论》,也收录了《文赋》。至于唐代类书,如《艺文类聚》等,也有收录。

《文赋》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呢?主要是它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

首先是艺术构思问题。《文赋》小序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意”的重要性,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文赋》中多次提到“意”,如“辞逞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又如“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又如“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协。”有时,“意”与“物”对举;有时又与“辞”对举;有时又与“心”对举;有时又与“文”对举。此“意”是指在构思过程中产生的意,而“物”主要指外在景物等,当然也可能包括社会生活和作家思想感情等内容。在陆机看来,意以称物为能事,而文却又很难准确传达这种“意”。而“言”与“意”的关系,既是创作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又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命题。“意”的涵义非常丰富,有情感,有学识,理性与感性交织在一起。而“言”的作用就是将作者之“意”表达出来。

由此出发,作者先从作家的“意”开始,《文赋》开篇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这时,指的是创作构思进入文学创作状态,陆机借用老庄“虚静”说,特别强调了灵感的关键作用,同时又兼顾创作主体进入“虚静”心境“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用赋的形式,强调了想像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同时,陆机还强调了作者的创造能力,他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主张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同时又必须独抒己意,反对因袭守旧。

其次是谋篇布局问题。艺术构思完成后,进入写作过程,即从感性进入理性阶段“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在这个阶段,陆机依然强调“意”的重要,意为主干,所谓“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主干立,文辞才像枝叶一样繁盛。所谓考辞就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按照不同的文体给予不同的关照。为此,他提出 10 种文体,并分别予以界定“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就比曹丕所提出的 4 种文体又丰富了许多。

第三是美学标准问题。在陆机看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之后,更重要的工作是情思的梳理,文字的推敲,声韵的抑扬,色彩的调配,等等,为此,他提出了应、和、悲、雅、艳等五个美学标准,《文赋》曰:“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而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谐和,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故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而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丝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所谓“应”,是对篇幅的要求。李善注说“短韵,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曰穷迹,迹穷而无偶,故曰孤兴。”如果文章过于短小,俯仰之间就无所呼应。换一个角度理解,他认为文章要有规模和气象,俯仰之间,通篇照应。而“托言短韵”则达不到“应”的要求。所谓“和”,是对文辞的要求。他认为文辞搭配要和谐,不能有“瘁音”。“瘁音”即弱音。所谓“悲”,是对情感的要求。他认为文学创作当以悲为美。这种悲情,是发自内心的情感。以悲为美,也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追求。《后汉书·左周黄传》载“三月上巳日,(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暱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曹丕《善哉行》其二说:“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流郑激楚,度宫中商。感心动耳,绮丽难忘。”曹植《赠徐幹》说“慷慨有悲心,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自成篇。”刘宋时期的王微也说　“文辞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4] 1667所谓“雅”，是对格调的要求。他认为文章格调要高，“会意”要“巧”，“遣言”须“妍”。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准。刘勰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钟嵘评价曹植是“情兼雅怨。”所谓“艳”，是对韵味的要求。

《文赋》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文体的分类方面，较之前代作家有了更加明确的辨析。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说　“陆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作《文赋》。”这里所说的“文体”，不仅指风格，也指文章体裁。中国的文体分类学论述，较早见于蔡邕《独断》。该书卷上论官文书四体曰：“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同时稍后的曹丕著《典论・论文》略举四科八种文体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认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陆机《文赋》则有扩大到十体，并对各体的特征有所界说。此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直至任昉的《文章缘起》①《文心雕龙》等均有或详或略的文体概论，条分缕析，探颐索隐，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萧统广采博收，去芜取精，将先秦至梁代的七百多篇优秀作品分成三十七类加以编录，②成为影响极为久远的一代名著。从蔡邕《独断》到萧统《文选》，前后绵延三百多年，中国文体学最终得以确立。[5]

《文赋》的意义在于，陆机提出的理论主张是建立在丰富的创作实践基础之上的，而且这篇理论文章，本身又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理论与创作，密不可分，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我们研究文学批评史，自然也就不能脱离文学创作实际而空谈理论。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晋书》卷 68《贺循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2]　房玄龄《晋书》卷 40《贾充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3]　叶矫然《清诗话续编・龙性堂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4]　沈约《宋书》卷 62《王微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5]　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载《文学遗产》2002 年第 5 期。

The Tragedy and Works of the “Two *Lu*s”

LIU Yue-j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Lu Ji and Lu Yun, who were writers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are called the “Two *Lu*s” by Zhong Rong. The Lu was a prominent race in the southeastern. Lu Xun, grandfather of the “Two *Lu*s,’’ was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State of Wu, and Lu Kang, father of the “Two *Lu*s,” was the Great Secretary of Wu. When the State of Wu perished, Lu Ji and Lu Yun withdrew to their hometowns for ten years, and later, when they were visiting the distinguished scholar Zhang Hua in the capital of Luo Yang, they were regarded highly of. However, they lacked successes in political affairs, and Lu Ji even died in “the upheaval of the eight prin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u Ji and Lu Yun varied a great deal, which could be seen i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is led to different forms of styles and features. Lu Ji’s works were various and heavy in pattern while Lu Yun’s were concise and clear. But they both emphasized the social worthiness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effect of the art of literature. In Lu Ji’s work, *Wen Fu*, he elaborately discussed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made a series of valuable claims on conception of art, organization of layout, aesthetic standard, and on the aspect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ry forms.

Key words: Lu Ji; Lu Yun; literary creation; *Wen Fu*

(Trs. Yun Tianyu, Li Peijun)

(责任编辑　赵　明)

① 中华书局影印元刻《山堂考索》本。其真伪颇多争论。同门傅刚《〈文选〉与〈诗品〉〈文心雕龙〉及〈文章缘起〉的比较》(收在《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朱迎平《〈文章缘起〉考辨》(收在《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均认为《文章缘起》为任昉作，其说可从。

② 通行本三十七类，但是根据南宋陈八郎宅刻五臣注《文选》，还有“移”“难”两体，这样就有三十九体之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